

我与书有不解之缘

毛勇强

如果存在“缘分”的话,我则与书有不解之缘。

不论是孩提时代,还是进入老年的今天,我对打扑克、麻将、下棋、唱歌和跳舞等,都不大感兴趣,老是学不会或学不精,也许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缺乏“缘分”吧!

但是对于书本,好像与生俱来一样,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还未入学时,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依稀懂得了“少小不努力,老来空自悔”的道理,并认识了百余个字,还迷上了小人书,虽然不能完全看懂,却看得十分“投入”。只要有小人书看,便常常忘记吃饭,或者边吃饭边看。看完后,还能将故事梗概讲给小朋友们听,表现了一点点与书有缘的天赋。

遗憾的是,当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却遇上了特殊阶段,看着那些小人书和一批“大部头”,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觉得万分可惜。

尽管这样,书还是有得看的,只不过受到诸多限制罢了。但是,我对书的感情仍不改初衷,除将老师规定熟读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语录”念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外,还千方百计找书看,如到新华书店看小人书,阅读当时颇为流行的《红小兵》杂志等等。

特殊阶段过去后,“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因此,很多人将“幸存”的书籍拿到供销社收购站或门市部卖。正好我母亲是一个门市部的负责人,常常收购到各类书籍。简直天助我也!于是,我便免费得到大批书籍阅读,如《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等等。一次,我“偷”了几本书籍和有兴趣的小朋友爬上鱼塘边的相思树上,由于太专注,一不小心竟跌进鱼塘里。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幸好路过的一位农民伯伯将我救起,不然真是

为书而亡了!从那以后,我便决心学游泳。在哥哥手把手的“训练”下,几经努力,终于也能在河里“驾驭自如”了。因为看书而学会游泳,真是名副其实的缘分。

初中、高中阶段,读书还是没有自由,书店里除了一些永远卖不出去的书外,很少有新作露面,我们只好借书阅读。说来也怪,那些被列为“大毒草”的小说,同学中的活跃分子却不知用什么手法,总是能弄到。如《三家巷》《苦菜花》《野菜花》《芦荡火种》《茫茫的草原》《围城》和《秋天里的春天》等等。那时,我们除了参加校办农场的劳动、文艺宣传队和球队外,学习轻松得很,因而有大量的时间去啃那些火砖一样厚的小说。这些小说构思奇妙、情节紧凑、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吸引了我时常在课堂里将小说放在桌底下偷偷地看,或者晚上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为此,多次受到老师的批评。一次,在劳动之余,我拿出《青春之歌》躲到树林里看,恰巧被教导主任看见。心想这次可糟糕了!好在我和主任关系不错,才使借来的小说免遭“烈火焚烧”的劫难,也没有给我带来麻烦。就这样,在读高中的两年时间里,在偷偷摸摸、躲躲藏藏中,居然看了几十部中长篇小说,得益匪浅。

高中毕业后,紧接着加入了“接受再教育”的行列,虽然算是参加工作了,但是每月只有八元钱生活费,根本不敢奢望购买书籍。“穷则思变”,我只好到处借书,甚至手抄。1979年才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二次握手》,我早在1976年便读了手抄本。1979年《作品》刊登了陈国凯的力作《我该怎么办》。这篇短篇小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人们争相传阅。但苦于僧多粥少,几经努力,还是未能借到。后来,听说化州城有个亲戚订阅《作品》,于是不辞劳苦骑车十余公里前往借阅,但那位亲戚婉言谢绝,因为他家

里的人还未看。我心一横,决定将小说抄下来,经过几小时的“奋战”,终于如愿如偿。拿回农场后,大家互相传阅,感激不尽。在农场的4年多时间里,我与书为伴,与书为友,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积累了知识,也汲取了无尽的力量,领会了“挫折和逆境是砥砺人成器的母亲”和“身处逆境须发奋,发奋之士终成业”的含义。1979年回城以后,有了自由支配的钱。更可喜的是,那些被禁锢多年的各类名著纷纷被解放出来,一批新作也陆续出版,使我也获得一种“解放感”。于是,我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外,余下的都“交”给了书店。戴厚英的《人啊,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一批名著陆续出现在我的书架上。既可以随意购买书籍,又能名正言顺地看,对于一个嗜书的人来说是多么惬意啊!

书籍多了,自然与藏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看来,没有书籍是无用的。因此,我极少将书作废品卖掉。经多年积累,我已拥有装满好几个大书柜的中外名著和各类书籍。其中有1966年出版、当时定价八分钱的《毛主席诗词》等等。一些收藏爱好者曾出高价收购,被我婉言谢绝了。

俗话说:“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酸甜。”读书多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于是我拿起笔来,既写新闻稿件,又写报告文学、散文和论文、调查报告等。几十年来,在各级报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这也许与坚持不懈地读书有关吧。1993年以来,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我的报告文学、散文集《春华秋实》《跋涉者的足迹》《笑对人生》《故园情怀》《松林旭日红》和《两手空空的“大富翁”》,使我这个“书呆子”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想起小姨

谢秀凤

小姨离我们远去一晃就五六六年了。“表姐,我想你以我妈为题材,写一篇关于我妈的文章,行吗?我想念我妈了”。翻开与表弟的聊天记录,我的心骤然收缩,想起小姨到了畅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却猝然长逝的境况,总禁不住眼眶泪水。

小姨是外婆十九岁时生下的第六个孩子。在旧社会,外婆十二岁就当童养媳,廿九岁的时候,膝下已有两子三女,肚子里还怀着小姨,小姨出世前在外婆的肚子里折腾了两天两夜,就在她呱呱坠地的前一天晚上,外公突患急病撒手西去。迷信的亲戚说是小姨脚太重,来的时候踩死了外公。成了遭报应的小姨命途多舛却心地善良,隐忍坚强。

外公去世后,外婆在这个上无老,下有小家庭里,用柔弱的双肩独自挑起了抚养六个孩子的家庭重任。待到小姨长到17岁的时候,为了缓和穷困的生活处境,外婆不得不将她嫁到一个距家五六十里的僻远小山村。一年后,大姨死于难产。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姨离世不到一年,大舅父就开始精神失常,因为没钱医治,病情一再拖延,最后发展到痴疯癫癫上街抢东西,那时因为饥饿,大舅父抢得最多的是饭店里顾客从窗口端出的粥、饭、面包等,他为此也常常被一些店员和顾客用泛着油沫的开水照着脸庞和手脚淋下去,有一次还被人掰断了两根手指。因为有个精神病哥哥,小舅一直找不到对象,多次相亲告吹后,传宗接代的重任便落到了小姨身上——三角换亲。没有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祝福,小姨默默的收拾几身换洗的衣服,嫁入了当时最穷的姨家。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上世纪七十年代,贫穷的家庭,

缺少少食是常事,对于需要换亲的家庭来说更可想而知,为此,舅妈的嫂子离家出走,舅妈也依葫芦画瓢回了娘家,而小姨,就算外婆和小舅再三托人捎话叫她回娘家,她还是痴痴的呆守着她和姨父缔结的那个穷窝窝,尽管会不时遭遇家暴,她也默默的忍受着,对前来劝说的亲友说:“既然成了家,就要担起家庭的责任,一时赌气离去,日后会有一堆家务杂事缠上,半生也理不清,没有谁去为你分担,勤勤恳恳守住家,日子才能有盼头。”有小姨的示范与坚持,不久,舅妈和她的嫂子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踏踏实实过日子。

小姨对我的爱,完全不逊色于我母亲。我儿子出世时,家公家婆已到耄耋之年,体完产假,正为找保姆犯难时,小姨义无反顾的来到我家,为我排忧解难。孩子上幼儿园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神经衰弱彻夜难眠,那时恰逢小姨做了个小手术,看到我好不容易入睡,她宁可在身上别着尿袋帮我接送孩子也不愿叫醒我。每次回乡下,她总把瓜果蔬菜禽蛋塞进提篮,满满当当的带给我,还分给我的邻居,我给她钱,她又会变着法子将钱拿出来帮补家用。人住县城,常常听人说:都市没有人情味,对门相见不相识,可小姨来到我家,需要买菜的邻居可以叫她顺手带一把;看见急于上班又要送孩子上学的年轻家长,她会毫不犹豫的说:“交给我吧,一只牛系(是)睇(放),两只牛也系睇”,然后一手牵一个小孩,小心翼翼的过马路;就连修剪绿化带的阿姨都可以放心把水管递给她帮忙浇灌花草……

一门心思为外家,为亲朋,唯独没有装进自己的小姨,愿您天国好好爱自己,天天开心快乐。

三千里西迁路： 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传奇

王如晓

2013年秋,我因工作需要前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学习。站在斑驳的校舍前,讲解员讲述的联大西迁往事,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里,一群文弱书生以脚步丈量三千里崎岖,一群绿林好汉以良知守护民族火种,共同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文脉传承传奇,令我们万分感动,至今难忘。现整理成文,以慰先辈。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裂了华夏大地的宁静,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昔日书声琅琅的燕园、清华园、南开园,沦为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为保存中华教育的火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毅然南迁,在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试图在战火中为学子守住一方书桌。

然而,和平的曙光转瞬即逝。仅仅数月,日军轰炸机便频频掠过长沙上空,炮弹撕裂长空,这座城市再也难寻片刻安宁。1938年初,战火逼近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面临着生死抉择:要么留在沦陷区接受日寇奴化教育,要么再次踏上迁徙之路,远赴西南边陲寻找安身之地。

经过慎重商议,学校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全体师生西迁昆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迁,而是一场跨越三千里的生死远征。据史料记载,三校学生(正取生)共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还有218名借读学生。包括老师在内,共1700多人徒步西迁。彼时的湘西、贵州、云南一带,崇山峻岭连绵不绝,山路崎岖难行,更可怕的是,这片区域自古匪患横行,山大王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是家常便饭。1700多名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要穿越这样的凶险之地,无异于羊入虎口,九死一生。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得知师生们的徒步计划后,心急如焚。他深知,这些青年学子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文脉的传承者,绝不能让他们葬身匪患或战火之中。一边是日寇步步紧逼,一边是绿林凶险万分,调兵进山剿匪不仅耗时费力,还可能激化矛盾,危及师生安全;强行开路更是行不通,茫茫群山,匪帮盘踞,根本无从下手。

千钧一发之际,张治中将军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不调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而是提笔写下一封致沿途所有匪首的公开信。在那个官府与绿林势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水火的时代,堂堂一省主席放下身段向土匪“求情”,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这封信里,没有威逼利诱,没有强权施压,只有滚烫的民族大义与赤诚的家国情怀: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中华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保存文脉,培育青年,才是守住民族希望。今有青年学子一千多人,皆是国家读书之种子、民族未来之栋梁,他们身携唯有书籍,所求只为读书救国。诸君身处绿林,多为乱世所迫,并非天生歹人,华夏大义,人皆有之,望能高抬贵手,妥为护持,保他们安然过境,便是保全国家元气,功在千秋,利在万代。”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张治中将军没有将土匪视为敌人,而是相信他们骨子里流淌着华夏儿女的热血,心中藏着不灭的民族良知。他以“读书种子”唤醒他们的家国情怀,以民族大义触动他们的内心底线。

这封信很快传遍了沿途各个土匪山寨。平日里打家劫舍、与官军周旋到底的悍匪们,读完信后皆沉默不语。他们或许迫于生计落草为寇,或许对官府积怨已久,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没有人愿意成为民族的罪人。他们深知,国土可以沦陷,家园可以残破,但民族的文脉不能断,国家的希望不能灭。

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沿途所有匪众不约而同地选择放行。有的匪首提前撤下山间所有关卡,清空道路,让师生队伍畅通无阻;有的主动派出手下乔装成山民,暗中一路护送,贴心提醒他们何处水深、何处路险、何处暗藏危机;更有匪首立下死命令:但凡遇到这群徒步求学的青年,一律不得阻拦、不得劫掠、不得伤害,违者重罚!

就这样,1700多名师生踏上了三千里征途。六十八个风雨兼程的日夜,他们衣衫褴褛,风餐露宿,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泉水。沿途所见,尽是战火过后的村寨萧条、饿殍遍野,乱世的苦难深深烙印在每个学子心中,更坚定了他们读书救国的信念。

在凶险万分的群山之中,这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队伍,竟一路有惊无险。没有土匪拦路,没有恶人敲诈,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全程默默守护。这些绿林好汉,向来劫富不仁、抢劣绅,只对为富不仁、欺压百姓之人下手,可面对这群一心只为守护民族文脉的穷学生,他们放下了手中的刀枪,守住了民族底线,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国家的未来。

1938年4月,历经千难万险的师生们终于平安抵达昆明。他们汇入新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茅草搭建的教室



▲中文系全体书生大合照。

▶简陋课堂,学子苦读。

里,在土坯制成的书桌上,在煤油灯的微光下,继续潜心求学。尽管条件极其艰苦,师资却汇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等大师云集于此,与学子们一同坚守。

在西南联大的八年岁月里,这群师生以知识为刃,以笔墨为枪,在烽火中坚持教学与研究,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以及171位两院院士。这所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奇迹”的学府,不仅保存了中华文脉的火种,更培育出了支撑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

回望1938年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我们总能看见华夏儿女的铮铮风骨。殿堂之上,张治中将军运筹帷幄,以一封书信唤醒良知,守护民族文脉;草莽之中,绿林好汉深明大义,放下私利,坚守民族气节;江湖之远,莘莘学子不畏艰险,以脚步丈量信仰,以读书践行救国。

一群被逼落草为寇的普通人,在最黑暗的世道里,放下恩怨,摒弃私利,做了一件最干净、最有骨气、最值得铭记的事;一

群文弱书生,在最艰难的境遇中,不畏艰险,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守护文脉的希望之路。

三千里西迁路,走出的从来不止一群求学的书生,更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永不沉沦的底气。它见证了华夏儿女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永不磨灭的家国大义与民族风骨。

如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西南联大的旧址静静矗立在昆明,成为后人缅怀历史、传承精神的圣地。但那段烽火中的传奇从未远去,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国土可沦陷,家园可残破,但民族文脉不可断,国家大义不可去。只要华夏儿女同心同德,心怀家国,守住文脉,坚守气节,我们这个民族就永远有希望,永远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生生不息。